

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

郑方泽编

中国文学史函授自学资料

吉林省

中国文学史函授自学资料

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

(1834—1918)

郑方泽编

吉林省函授学院

一九八一年·长春

序

郑方泽同志所编《中国近代文学史事编年》一书，我有幸读了原稿，收益很大，极愿意向大家介绍推荐。但是一向记得清朝学者顾亭林的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所以动笔之前，曾经踌躇再三。当然，既然心底有话要说，顾虑终归会被打消的。

我想说的主要有三点：

一是我深知这本书有用，对近代文学教学和研究，以及语文教学都有用，值得推荐。

鲁迅先生讲到文学研究要“知人论世”的时候，曾经说过：“分类有益于揣摩文章，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并且还拿古人年谱，近世人时有新作的事证明大家已经在省悟这个道理。（见《且介亭杂文·序言》）话讲得极好，只是编年史体专记文学者少，众家年谱也不易置备。如今编者将八十多年间，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作家行止、作品出处、文学社团活动、文艺报刊印发，提要钩玄，列在一编，实不啻集多册年历和百家谱叙于案头，其便于治学参考是极为明显的事。

其二，这书成书有独创性。我很同意编者讲的是“填补目前尚无这类资料用书的空白”之作。大家熟知，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的八十年间，在我们祖国是一个狼烟四起、国事翻腾、仁人献身、志士奋笔的年月。时代光耀，文艺必然丰硕。试稍一回想，那些生动的

人物形象和有气势的作品就会浮现在眼前。龚自珍马过镇江，有祭神名作“九州生气恃风雷”。林则徐抗英遭贬，在充军伊犁途中，引吭高歌“白头合对天山雪，赤手谁摩岭海云”。洪秀全、石达开既是革命领袖又是诗人作家，黄遵宪《望月作歌》，谭嗣同《狱中题壁》，还有秋瑾女士泣血的《绝命词》。这些作家作品将历史的生机，人间的正义，尽收笔底，至今读来受到鼓舞。再加梁启超、章太炎笔锋饱含激情的议论文章，李伯元、吴沃尧、刘铁云、曾孟朴等人的小说，或刻划鬼蜮，谴责魔道，或状祖国山川，述异域风物，都很有特色。凡此种种，都曾使一代读者开阔了眼界，是中国文学史上起了承前启后，融汇中外作品的丰收期。面对着文学上的重大成就，相对来说，发掘整理、研究的工作就很不够了。阿英同志开拓于前，后来实在应该接续上。在这项工作上，郑方泽同志治学象教书一样“爬罗剔抉，刮垢磨光”，“寻墜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这样的治学观点和辛勤劳动都是值得称许的。至于他编写中的具体思路、方法、工夫，有本书《叙例》在，就不多说了。

第三，说来象是离题的话，其实又是我感触最深，最想说的话。我和编者同事已经多年，初见时他还是二十多岁的青年教师，经过十年动乱，转眼他已是中年了。难得的是，就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肯找我谈些读书做学问的事，那时我是感到惊奇的。当然，教师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抓紧学习，勤奋工作。苦干实干才出成果，才不会象阿Q那样高喊“我手执钢鞭将你打”，其实手里连根稻草都没有，实必买空卖空。我相识的当年的年轻教师如编者的还很多。所以，我竟然敢于在一些场合里，跟几位老教授顶撞起来，说慨叹治学上“后继无人”的话是不确实的，原因就在于此。

打倒“四人帮”，百废俱兴，我们又都重新操笔，操起钢笔和粉笔加倍工作了。编者在紧张的教学工作中，不但整理出这积年之作来，并且还在不断蒐集材料，要继续充实修改好。

在喜读党的六中全会公报，体会文件精神，内心振奋之至的时刻，怀想过往相濡以沫的岁月，翻读摆在眼前的成果，我是既感且惭，又那能在读后不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呢！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人之患在好为人序”的话都不准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才既是可取的古训，又是党的教导。

赵 则 诚

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

叙 例

一、中国近代文学史料的整理和研究，历来涉足者少，可以说还是一块向来被人冷落的“生荒地”。梁启超在一九二〇年所著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就曾过早地认为：“清代文艺美术，在中国文艺史、美术史上，价值极微。”那时，他是以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来衡量这“价值”的。他还没有来得及认真观察、研究近代文学对现代文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认识其真正“价值”，就离开人世了。今天，我们以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观点，按照文艺本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加紧开发这块“生荒地”，揭开中国近代文学迷蒙的面纱，就不难发现，在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中国近代文学同样有着极其可贵的“价值”。它既是古代文学发展的终结，又是现代文学产生的过渡。作为终结，它表现在各种文学的创作上，数量之多，题材之广，作家队伍之庞大，文艺思想斗争之激烈，文学与现实密切联系所反映出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精神，以及文学随社会变革的迅速等等，都留下了新旧文学交替的特定面貌，显示出封建阶级旧文学的衰退，资产阶级新文学的崛起；作为过渡，它酝酿了以“五四”新文学为开端的中国现代文学的蓬勃发展，对各种文学创作的繁荣，文艺理论的提高，外来文学的汲取，以及在作家创作思想、创作方法等方面所带来的历史性的变革，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文学史上，就是在文化史上也有着启蒙的意义。因此，整理、研究这份文学遗产，认真探索近代文学

发展的客观规律，借鑑其历史的经验教训，这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的文艺事业，使之适应今日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及世界进步文学的潮流，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其“价值”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

二、阿英同志是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为了开发这座文学宝库，他出力最多，贡献最大，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富的遗产。本书就是在继承阿英同志和其他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再吸收有关专著及报刊文章所提供的新资料、新成果，加以归纳整理，纂编成书的。暂且填补目前尚无这类资料用书的空白。

三、中国近代文学的分期，一般是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起，到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为止。本书所记史事将上限提前到一八三四年，意在提供鸦片战争时期，近代文学序幕揭开前的历史背景。所记月日，凡用汉字标数者，均为夏历，多用在民国以前；凡用阿刺伯字标数者，均为公历，多用在民国以后。

四、凡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中出现的主要作家、作品、文艺思想斗争、文艺流派社团和文艺报刊等等，本书均尽量搜集编入。力求资料翔实可靠，大体完备。编排体例全都按年系事，或因事系人，以见是时文学之概况。企图编成一本带有编年史性质的资料用书，从中反映出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梗概，并为学习、研究中国近代文学提供基本的资料线索。对作家、作品和有关的学术著作，以及文学流派社团，都有简要的评介，并在书末附有作家、作品、文艺报刊（包括兼载文艺的报刊）及文艺流派社团的索引，以便查阅。

五、所列近代作家生平简介，凡在本书编年中逝世的，均在卒年介绍；凡跨代的作家，卒年在五四运动以后，均在

参与文学活动的最初年份介绍；其生卒年不详者，均据史实，在其活动的年份中介绍。

六、由于编者的学识和所见资料的限制，本书所记史事尚欠完备，在资料的考辨和编排的体例方面，也难免有不妥之处，尚望读者指正，有待今后补充、修订，以臻完善。

七、本书在辑集纂编的过程中，得到院系领导的关怀。中文系赵则诚副教授审阅稿件，热情指导。吉林省图书馆和我院图书馆的同志积极支持，大力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目 次

序 赵则诚 (1)

叙 例 (4)

编 年 (1)

附 录

作家索引..... (348)

作品索引..... (353)

文艺报刊 (包括兼载文艺的报刊) 索引..... (359)

文艺流派社团索引..... (361)

1834年（道光十四年 甲午）

本年，英国输入鸦片增至二万一千余箱，白银大量外流。清政府自嘉庆（1796—1820）初年开始禁止鸦片以来，至今仍然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面临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

一、清政府对社会风气日变的现象，深感不安，归罪于传奇、演义的刊行，于二月二十五日发布禁毁传奇、演义板书的通谕云：“御史俞焜奏，请申明例禁，以培风俗一折。……近来传奇、演义等书，踵事翻新，词多俚鄙，其始不过市井之徒，乐于观览，甚至儿童妇女，莫不舐闻而习见之，以蕩佚为风流，以强梁为雄傑，以佻薄为能事，以秽褻为常谈；……刑讼之日繁，奸盗之日炽，未必不由于此。嗣后各直省督抚及府尹等，严飭地方官实力稽查，如有坊肆刊刻，及租质各舖一切淫书小说，务须搜取板书，尽行销毁。”

（见《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百四十九）

又，据邓之诚《骨董琐记》卷六《小说禁例》云：“康熙五十三年（1714）四月谕礼部，朕惟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正风俗，必崇尚经学而严绝非圣之书，此不易之理也。……又道光十四年（1834）二月，特谕申禁坊肆淫书小说。据此，知明季以来小说，多不传于世，实缘康熙有此厉禁。自乾隆中叶以后，託于海宇承平，禁例稍宽，《红楼》、《绿野》、《儒林》、《镜花》诸著，遂盛行一时。虽道光申禁，而《品花》成书于丁酉（1837），在禁后

二年，《儿女英雄评话》，且出于朝士文康之手。唯小说为道咸后重刻者，略删猥褻过甚语而已。或谓是时宫禁中流传甚广，故不能绝。”由此可见，有清以来，禁毁小说之概貌。

（以上均转引自王晓传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二、阳湖派的重要作家陆继辂逝世。陆继辂（1772—1834），字祁孙，一字修平，江苏阳湖人。嘉庆举人，官至江西贵溪县知县。为文偏于骈俪，与李兆洛交往甚密，常相切磋，均为一时骈散名家。李兆洛《贵溪县知县陆君墓志铭》云：“读书夙成文彩，四照音声，清如唳鹤，吐辞隽婉，常倾座人，当代先达有人伦鉴者，争罗而礼焉。不肯轻涉世事，惟肆力于诗，清温多风，如其人也。”著有《崇百药斋文集》四十四卷、《生斋诗文稿》十七卷、《生斋日知录》三卷等。

又，阳湖派，是一个由阳湖人张惠言（1761—1802）、恽敬（1757—1817）所开创的散文流派。陆继辂是继张、恽之后的重要作家，他在《七家文钞序》中述其渊源演变云：“乾隆间，钱伯坰鲁思亲受业于海峰之门，时时诵其师说于其友恽子居（恽敬）、张臯文（惠言）。二子者，始尽弃其考据骈俪之学专志以治古文，盖臯文精研经传，其学从源而及流；子居泛滥百家之言，其学由博而返约。二子之致力不同，而其文之澹然而清，秩然而有序，则由望溪而上求之震川、荆川、遵岩，又上而求之庐陵、眉山、南丰、新安如一轍也。”可见阳湖派实出于桐城派，但又不受桐城派古文的约束。作文不似桐城派为了求其统之正，只以儒家经典为宗，而又“泛滥百家之言”，好骈文，重工丽，文风较为恣肆，力矫桐城文之平钝纤弱。阳湖派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的桐

桐城派正处于考据家排斥，骈文家对抗的夹攻之中。桐城派自清中叶以来统治文坛的地位，已经开始动摇，直到梅曾亮、曾国藩之辈出，才又形成同治“中兴”的局面。

李崇元在《清代古文述传》中，评述阳湖派的渊源及其与桐城派的差别云：“夫阳湖诸家，其始多自魏晋六朝入，折而求之唐宋，直上溯史汉，跻周秦。桐城诸家多自唐宋入，由唐宋而史汉，而周秦，此其治学为道之不同。故文笔意境，乃不能无异，要其根据经义，因文见道，舍虚而就实，则茗柯之学，与望溪、惜抱固殊途同归也。览者得其文笔意境之异焉可也，谓是桐城、阳湖之别也。”（见该书第57—58页，商务印书馆，1940年12月初版）

又据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5月初版）所述，阳湖派源于桐城派，这一时期自成一派之师承关系如下：

刘海峰（桐城派大师）——钱伯坰——恽敬、张惠言。

恽敬——谢士元、谢帽、方淦（私淑）、秦臻（私淑）。

张惠言——张琦、董士锡、陆继格、汤诒、罗梅、江承之、金式玉、杨绍文、吴吴育、陆耀遒、周凯。

陆耀遒——董祐诚。

周凯——戴熙。

三、本年逝世的作家，还有：

吴嵩梁（1766—1834），诗人。字子山，号兰雪，江西东乡人。嘉庆举人，由内阁中书官贵州黔西州知州。作诗体沿六朝而规格则似唐之温、李，诗才与清著名诗人黄景仁相符，是江西诗人中，自明以来比较杰出的一个。有《香苏山馆诗钞》。

《江西通志·吳嵩梁傳》云：“（嵩梁）受詩法于鉛山蔣士詮，得杜陵宗派，出游吳越間詩名籍起，……名振都下，青浦王昶、北平翁方綱、無錫秦瀛、蒙古法式善、錢塘吳錫麒并相推重篇什，流播及于海外，朝鮮侍郎申緯推為詩佛，吏部判書金魯敬父子鑲梅花為龕奉其像，并嘗置所為詩卷。嘗于仲春日集其國勝流，置酒高會，遙為嵩梁祝壽，好事者繪圖張之。琉球陪臣向邦正奏請入監肄業，亦出嵩梁門下，學成歸國。奉使來朝者皆以得其詩句為榮。”（又見《續碑傳集》卷七十七）

林昌彝于一八五一年刊行的《射鷹樓詩話》卷七，評介與吳嵩梁同時的江右詩家云：“近代江右詩家，蔣藏園（士詮）、吳蘭雪（嵩梁）而外，則為艾至堂（暢）及陳少香先生（偕燦）、湯茗孫舍人（儲璠）。藏園古詩高于近體，蘭雪近體高于古體，然蘭雪廬山五七古則入如桃源境界獨辟，至堂詩多超悟，茗孫詩多俊逸，陳少香先生初學劍南，次學東坡，近刻《焚余集》及《春雨樓詩》則老而益壯矣。”

陳壽祺（1771—1834），學者、散文家。字恭甫，號左海，晚號隱屏山人，福建閩縣人，嘉慶進士，官至記名御史。少為宋儒之學，常以古君子自期，後從阮元學，專為漢儒之學。辭官後，阮元延請主講詁經精舍。其詩文沈博絕麗，有六朝、三唐風格。有《左海文集》十卷、《左海駢體文》三卷、《絳趺堂詩集》六卷、《東粵儒林文苑後傳》二卷，及解經之書多種。

林昌彝評其詩曰：“福州陳恭甫先生《絳趺草堂詩》，馳騁才華，驅役曲籍，音調迫近盛唐而不必依傍摹擬，獨能拔出林派之外。”（《射鷹樓詩話》卷三）

又，林昌彝評介與陳壽祺同時的閩中詩家云：“閩中近

代诗家，足以雄视海内者，闽县龚海峰（景翰）、萨檀河（玉衡）、谢甸男（震）、陈恭甫先生（寿祺）也；侯官则许铁堂（友）、林畅园（茂春）、李兰屏（彦彬）也；建宁则张亨甫（际亮）也；光泽则何金门（长诏）也；福鼎则徐紬秋（滋秀）也。（皆从已歿者言之）”（《射鹰楼诗话》卷十一）

查揆（1770—1834），散文家。又名初揆，字伯揆，号梅史，浙江海宁人。官至顺天蓟州知州。文笔雄秀冠时，每赋一篇必为傑构。诗出入于查慎行、厉鹗之间，亦卓然成家。著有《箕谷文集》、《菽原堂集》。

四、作家行止。

魏源（41岁），本年秋，应谢元淮之邀，游海州云台山，作《海州云台山老松歌》。约在这时，为邓湘皋兄弟所作南村偶耕图作记。

曾国藩（24岁），本年肄业嶽麓书院，以能诗文，试辄第一，初有声名。

1835年（道光十五年 乙未）

本年估计，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在二百万以上（当时全国人口约为四亿多人）。流行的地区已从沿海扩大到内地的十几个省，在清政府内部引起了以林则徐为首的禁烟派和以许乃济为首的反禁烟派的激烈斗争。

一、浙派词的重要词人项鸿祚逝世。项鸿祚（1798—1835），字莲生，又名廷纪，浙江钱塘人。道光举人，以后

两应进士试，不第，思想消沉，曾避开喧闹的尘世，就读僧院。作诗不多，专力于词的研究和创作。作词泛学五代、两宋，而尤注重南宋诸家之长。受浙派词的影响较深，但能融会贯通，自成特色。词深细颖秀，刻画景物工整，有较浓的抒情色彩，多表现个人抑郁伤感的情绪，调子过于低沉，有《忆云词甲乙丙丁稿》。在其自序中也说：“生幼有愁癖，故其情艳而苦，其感于物也郁而深；……不无累德之言，抑亦伤心之极致矣！”又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谭献也评其词曰：“莲生，古之伤心人也！盘气回肠，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涩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无其率，有梦窗之深细而化其滞，殆欲前无古人。”（《篋中词》四）

又，浙派词，首由浙江嘉兴人曹溶（1612—1685）倡导。浙西词人朱彝尊（1629—1709）所开创。他在《静志居诗话》中述其源流云：“往者明三百禩，词学失传，先生（曹溶）搜辑遗集，余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春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于此。”朱彝尊力倡曹溶之说，成为一时风尚。其后厉鹗（1692—1752）等继起，浙派词大盛于清代中叶之词坛。至嘉庆、道光间逐渐衰落。项鸿祚出，为浙派之后劲，才又得短暂的复兴。他们作词推崇南宋诸家，以姜夔（白石）、张炎（玉田）为宗，崇尚清空，讲求声律词藻，过分在技巧上下工夫，追求形式美。内容一味拟古，寄兴不高，显得贫弱、狭窄，很少反映现实。因而，很快便被后起的常州词派所代替。

这一时期，正是浙西词派衰落，常州词派兴起的交替阶段。正如胡云翼在《词学概论》中所云：“乾嘉、道光，词人济济，考其作品，都属平庸。武进张惠言、张琦兄弟起而力矫其风，宗尚北宋，一时从之，于是又造成所谓‘常州派’

的词。”

二、本年逝世的作家，还有：

徐熊飞（1762—1835），诗人。字子宣，一字渭扬，号雪庐，浙江武康人。嘉庆举人，工诗及骈体文，名盛一时。著有《白鹤山房诗集》、《前溪风土词》、《六花词》、《骈体文钞》等。

陈用光（1768—1835），散文家。字硕士，一字贯思，江西新城人。嘉庆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曾从桐城派大师姚鼐学古文，学问、文章为时人所推重。并曾参加宣南诗社。这是一个成立于1804年，北京封建士大夫吟诗唱和的集社。著有《太乙舟文集》八卷。

梅曾亮对其古文评曰：“夫公之学，固出于姚先生，而文不必同。然前乎先生者，有方望溪侍郎、刘海峰学博，其文亦皆较然不同。盖性情异，文亦异焉。”（《太乙舟山房文集序》）

三、作家行止。

曾国藩（25岁），本年到京会试不售，留京读书。尝语人曰：“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法。”（《家书》卷一，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曾文正公年谱》卷一亦曰：“京师读书，研经穷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躐而从之。治古文词自此始。”

俞曲园（15岁），“每至菊花开时，与客分韵赋诗，有兰陵菊社诗行世”。冬，端木国瑚题曲园所居曰“印雪轩”，故其诗文集皆以“印雪”名。（徐澂谨辑《俞曲园先生年谱》）

汪梅村（34岁），“是年从荆溪任阶平先生游，专为时文。乡试未荐。”（《日录》）

四、清政府对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文艺严加取缔，于八月初八日，据御史富尔洪阿奏，又禁止“扮演高跷及女金斗爬竿蹴索等人，于街市聚集演唱。”（见《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卷二百七十。转引自王晓传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69页）

五、小说《鸳鸯影》坊刊小本问世。作者不详。共四册十八回，演嘉庆间才子佳人事。写柳素心与三才女之姻缘中间夹入奸佞，因婚事陷害才子，使其远征，终至昭雪归来，完成好事。内容不脱一般才子佳人书的老套，文辞也很拙劣。（按，本书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未载。今据阿英《小说三谈》第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1836年（道光十六年 丙申）

四月，反禁烟派的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准许公开买卖，立即遭到禁烟派的还击。八月，粤督邓廷楨等会奏拟定禁烟章程九条。清政府内部禁烟派和反禁烟派的斗争日趋激烈。

一、小说创作趋向低潮。这时正如鲁迅所指出：“雍乾以来，江南人士惕于文字之祸，因避史事不道，折而考证经子以至小学，若艺术之微，亦所不废；惟语必征实，忌为空谈，博识之风，于是亦盛。逮风气既成，则学者之面目亦自具，小说乃‘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史以为‘无可观’，故亦不屑道也”（《中国小说史略》）。这一时期的小说作